

艰辛付出 终有回报



普拉卡什·洛嘉尼

对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的采访，皮萨里德斯因其在
失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
杰出研究工作荣获
2010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有时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奖项或同时颁给那些观点相左的经济学家——比如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同时授予了左翼经济学家卡尔·冈纳·缪达尔（Karl Gunnar Myrdal）和自由派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或者表彰那些学术成就早已被人遗忘的经济学家，比如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颁给了一个志趣相投的小组：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戴尔·莫特森（Dale T. Mortensen）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开展的研究工作形成了有关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母机”模型（workhorse model）。该理论模型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在全球经济大衰退之后，全球有2亿人失业，让这些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成为当时各国经济政策中最为紧迫的一项任务。

皮萨里德斯是一位有希腊血统的塞浦路斯人。自1970年以来，他便一直从事失业问题的研究工作。经过长达20年的艰辛的学术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才开始改变其他经济学家们对失业问题的看法，随后其影响才渗透到政策领域。现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失业问题的著名学者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说：“克里斯一直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历史已证明他是正确的。这对其他的研究人员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启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如今，鉴于大家都会倾听他的意见，

皮萨里德斯可以利用诺贝尔奖赋予他的强大号召力来帮助欧洲应对其失业危机。他对所谓外国借贷者的“三驾马车”（即欧洲委员会、欧洲央行和IMF）的部分政策表示支持，但同时也对它们的其他政策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见专栏）。他在自己的祖国塞浦路斯表现尤为活跃。作为塞浦路斯全国经济委员会（类似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皮萨里德斯就各种经济问题（包括塞浦路斯的银行重组及其未来的商业模式等）向塞浦路斯总统提出建议。“塞浦路斯有大约10个电视频道，”皮萨里德斯说：“他们都追着我采访，要我发表看法。有时我真想回到大学办公室，闭门不出。不过我深知，如果真的那样做了，我会后悔不已。现在正是我出手相助的时机。”

前半生

皮萨里德斯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长大，小学和中学时成绩优异。据他母亲伊芙朵吉雅（Evdokia）说：“他的老师总是说他的数学成绩是最棒的。他学习总是很刻苦。”尽管皮萨里德斯在中学时成绩非常优秀，但在他申请的六所英国大学中有五所拒绝了他的申请，最后他在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伦敦经济学院是当初拒绝他的申请的大学之一，不过他最终得以被该校录取为经济学博士生，此后留校任教至今。对于当初被拒绝一事，皮萨里德斯处之泰然：“对于我来说，到埃塞克斯大学应该要好一些，因为这是个地方，他们更加重视我们。而在

伦敦经济学院，我可能很容易感到失落。”

获得博士学位后，皮萨利德斯回到塞浦路斯，到央行研究部工作。不过，冥冥之中的某种力量又让他重新回到英国。1974年，当他前去拜访自己在雅典的准岳父母时，塞浦路斯政府被推翻，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使他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他来到英国此前的老师那里寻求

皮萨利德斯一直致力于深入研究者与就业岗位之间的匹配过程。

帮助，几个月后他被安排到伦敦经济学院担任大学教师。“我于1976年搬到伦敦，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皮萨利德斯在其2010年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如是说。

匹配游戏

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经说过：“教会一只鸚鵡说‘供应和需求’两个术语，这只鸚鵡也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经典的经济理论认为，一种商品的供应过量会导致其价格下降，反过来又会促进需求增长，最终消除需求过剩的状况。应用到劳动力市场，这一经典的理论意味着，当劳动力供应过剩时，工资水平将会下降，（反过来促进就业机会的增长，）从而消除失业现象。然而，大量失业人口的长期存在（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情形）恰好与上述经典理论相背离。

20世纪60年代，包括戴蒙德和莫特森在内的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寻找工作的过程类似于找对象或者买房子的过程。比如，住房市场有大量的买家和卖家。双方经过一个搜寻的过程，最终找到令双方都满意的“配对”。价格是交易中的一个要素，但并非唯一的要素，买方往往还关注住房的其他特性。整个搜寻的过程非常耗时，因此部分住房可能暂时无法售出。就劳动力市场而言，这种“搜寻理论”在解释失业问题方面比经典的理论明显要更令人感到满意。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即将完成埃塞克斯大学的学业时，皮萨利德斯有幸结识了莫特森。莫特森强烈建议皮萨利德斯在伦敦经济学院读博期间继续研究“搜寻理论”。莫特森已不记得当初双方的会面，但在后来如此写道：“这毫无疑问是我曾给予我的学生的最佳建议之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皮萨利德斯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和任教，一直致力于深入研究者与就业岗位之间的匹配过程。英格兰银行前任副会长及伦敦经济学院教师查尔斯·比恩（Charles Bean）说，皮萨利德斯的博士论文以其强调信息不完备的价值而闻名。雇主对潜在就业工作者的能力不完全清楚，而工作者对潜在就业机会的情况也不完全了解，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式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皮萨利德斯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所开展的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贡献是开发了“匹配函数”（matching function）的概念。经济学家通常采用“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来反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利用技术进步，人们可以在同样投入的前提下实现更大的产出；然而，有时不利的条件或不良的政策选择可能阻碍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同样，皮萨利德斯将失业人口数量和职位空缺的数量视为可创造就业机会的投入要素。但这些投入要素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就业机会，将取决于信息不完备的程度、政府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因素。比恩表示：“尽管（匹配函数）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未知的‘黑匣子’，但它可以得到许多微观经济数据的证实，该函数还可基于实际的数据进行估算。”皮萨利德斯也利用博弈理论的观点来确定工作者与雇主之间成功匹配前的差距。比恩说，这提供了“一个简单但很有影响力的工资决定理论。”

尽管戴蒙德和莫特森也参与了类似的研究工作，但皮萨利德斯并不完全清楚他们的研究工作。皮萨利德斯在诺贝尔获奖演讲中说道：“（我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在‘电子时代’前开展的。”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些同事（尤其是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和史蒂芬·尼克尔（Stephen Nickell））也在使用他们特有的方法来研究失业问题，甚至有时皮萨利德斯会与他们合作。不过，皮萨利德斯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布兰查德回忆道：“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在伦敦经济学院见过克里

对欧元的担忧

大西洋两岸对欧元在1992年启动的反应截然不同。1992年9月21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四位著名教授，即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鲁迪格·多恩布什（Rüdiger Dornbusch）、史丹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共同参加了一个讨论会，并一致认为“一个统一的欧洲货币将对经济带来不利影响。”相反，许多欧洲学者却（对欧元的启动）感到欢欣鼓舞。皮萨利德斯曾经写道：“我完全认可这个建议。”他加入了塞浦路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帮助把欧元引入我的祖国”。早些时候，他曾先后在瑞典和英国的研究团队中工作过，负责研究采用欧元后对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然而，现在皮萨利德斯认为，采用欧元后“适得其反：它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导致了欧洲的分裂”。他认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德国和欧盟部分北方成员国可能适宜，但对于欧盟的南方成员国来说则“要求过于严格了”。特别是，财政紧缩政策正“造成受过教育的年轻失落一代……‘三驾马车’（即欧洲委员会、欧洲央行和IMF）和各国政府在执行财政紧缩政策方面应该适度放宽。”皮萨利德斯说，要么取消欧元，要么欧盟的领先成员国应该放宽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恢复南欧地区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斯。当时，整个学校对失业问题的研究非常关注。在很大程度上皮萨利德斯是一个人在长期艰苦地工作。他的研究模型看上去非常奇怪和复杂，而莱亚德-尼克尔的研究模型则非常简单……当时大家都认为克里斯不应该继续研究相关的东西，而他那时确实不是（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

付诸行动

皮萨利德斯在匹配函数方面的研究工作使得人们再次关注体现失业与职位空缺之间相互关系的“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这种相关性曲线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他发现：当经济快速发展时，失业率很低，空缺职位很多，而在经济衰退时情况刚好相反。皮萨利德斯不仅为该曲线提供了理论基础，还帮助解释了当经济摆脱衰退开始复苏时曲线的移动状况——称之为“环线”。在当前美国和其他劳动力市场极力摆脱“经济大衰退”影响的同时，如同皮萨利德斯此前所预测的那样，在贝弗里奇曲线周围出现了一些环线（见图1）。

皮萨利德斯研究工作的另一项实际意义是为那些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的政策提供了支持。这些政策称之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利于激励工作者寻找和接受就业岗位。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工作者在失业期间应该获得一定的收入保障津贴，但皮萨利德斯在诺贝尔获奖演讲中说道，政策还应该“对更多的求职采取激励措施，这样可以将贝弗里奇曲线推向原点，改善劳动力市场工

作者和就业岗位之间的匹配性能。”如果没有这些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工作者的失业持续时间最后就会很长，从而进一步“让失业者感到失望，剥夺他们就业的权利。”

这些研究成果已进入政策圈，并影响了各国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低迷状况的方式。例如，皮萨利德斯告诉《金融与发展》，在英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经济大衰退期间“为控制长期失业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尽管美国为失业者提供了失业救济金（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在借助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让失业者重新回到就业岗位方面则并未投入足够的努力，从而导致美国长期失业率令人不安地增加。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也因对失业问题的研究而闻名。他说，“克里斯强调，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失业者的技能将会丧失，由此必须避免使失业成为一个长期问题，这是他所做的一项长久贡献。”

顺应潮流

设想一下，假如你正为一个节日晚餐摆放餐桌，突然发现多摆了三张桌子。你会怎么办？去除多余的桌子，对吧？如果有人建议你先增加两张桌子，然后再去除五张桌子，最后相当于去除了多余的三张桌子，你肯定会认为这个主意傻得不能再傻了。然而，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似乎每月都在重复这种无用功。比如，2010年8月美国削减了10万个就业岗位。净减少10万个就业岗位是因为美国在创造了410万个新就业机会的同时，取消了420万个现有工作岗位。按照经济学家的专业术语来讲，与从失业到就业的总流动数量（“创造就业岗位”）以及从就业到失业的总流动数量（“取消就业岗位”）相比，就业岗位数量的净变动真是小巫见大巫。

就业和失业人数的巨大总流动量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为人所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哈佛大学的金·克拉克（Kim Clark）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芝加哥大学的史蒂芬·戴维斯（Steven Davis）以及马里兰大学的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等人的研究。这也为莫特森和皮萨利德斯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启发，表明劳动力市场实际上与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是一个每月创造和取消大量就业匹配、不断变化的市场。这要求他们建立一个明确的模型，必须与就业和失业总流动量以及在商业周期内的变动方式保持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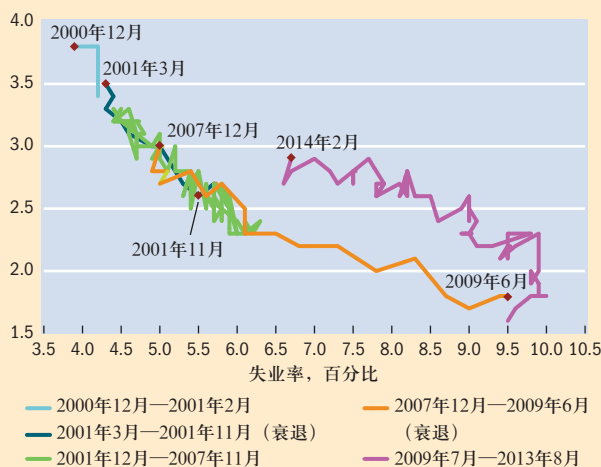
与匹配函数的研究工作所不同的是，上述模型的开发工作是由莫特森和皮萨利德斯共同完成的，两人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了长达十年的合作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假定一旦创造了就业岗位，这些岗位就无法针对新的技术做出快速的改变。劳动力市场不断受到技术以及其他会改变现有岗位收益性的发展动向的冲击。这种“特异性冲击”会取消一些就业岗位，导致失业，直至其他地方建立了新的就业岗位并取而代之。

图1

工作岗位很多，但唯有你需要时方才如此

贝弗里奇曲线表明，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很高，空缺职位数量少。在经济大衰退后，美国的“贝弗里奇曲线”周围出现了预期的“环线”。

（职位空缺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之。宏观经济的繁荣和衰退也会影响就业岗位创造和取消问题。莫特森和皮萨利德斯将所有这些要素整合为一个单一的模型，该模型与就业和失业的巨大总流量及其在商业周期内的变动方式保持一致。由于认识到戴蒙德早些时候为该模型的开发工作所做出的贡献，经济学

对于年轻工作者来说，给予他们选择就业的机会尤其重要。

家们取三位创建人姓氏的首字母，将该模型命名为“DMP模型”。布兰查德说，DMP模型“被证明为是一个理论奇迹，同时也是分析数据的极其有用的实用工具。”

“保护工作者，而不是就业岗位”

实践证明，在考虑如何设计劳动力市场政策时，DMP模型也非常有用。许多国家寻求通过各种行政程序来保护工作者免于失业，其规定雇主主要解雇一名工作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从根本上说必须支付一笔解雇税。一方面，这种就业保护法规通过限制取消就业岗位，确实减少了从就业到失业的总流动量。但另一方面，该法规也阻碍了创造就业岗位的机会。“当某个企业创造一个就业岗位的时候会想到，如果将来的某一天将这名员工解雇时他们就必须支付（高额的解雇）税。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因此而下降，”皮萨利德斯在其诺贝尔获奖演讲中如是解释。由于新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减少，从失业到就业的总流动量也随之下降。

总而言之，一项旨在保护工作者免于失业的政策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策通过对创造就业岗位造成的“激冷效应”（见图2），实际

上会延长失业者的失业时间。DMP模型的理论含义为现已成为一项准则的说法提供了支持，这项准则就是“保护工作者，而不是就业岗位”。借助过度限制企业解雇员工来尽力保护现有就业岗位的做法，可能抑制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体所必须的工作流动性。最好是通过提供失业救济金和其他收入保障津贴来保护工作者免于受到失业的影响，同时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让失业者在其技能和信心恶化前找到适宜的工作，重返就业岗位。

过度的就业保护还可能导致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年轻人通常不清楚他们擅长的领域或者自己喜欢从事的工作，而雇主对他们今后的表现情况也没有把握。因此，皮萨利德斯说，对于年轻职员来说，“给予他们选择就业的机会”尤其重要，“正如不可能要求他们和自己的初恋结婚一样，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守着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一辈子不变。”他说，就业保护法规有利于年纪较大的“男性工作者，但对其他类型的工作者（如更为频繁地在劳动力市场流入和流出的女性和年轻人）则不利。”

微笑服务

在过去的十年间，皮萨利德斯已将其研究工作的范畴扩大至结构性变化问题。他说，随着各个经济体转向服务业，必须“将服务业视为（提高生产力和促进增长的）推动因素，而非阻力。”他认为，对于许多新兴市场来说，过度依赖制造业存在很大的风险，这是因为“制造业中的许多低成本工作既不能为工作者提供掌握高科技的技能，也不能为之提供人际交往技能”，而这是许多未来岗位所需要的（参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并非你父辈时的服务业”）。

皮萨利德斯告诉《金融与发展》，在欧洲，“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缺口是向公众和企业提供服务的岗位。”提高就业的灵活性以及向雇主提供更好的激励政策，可以在零售、酒店和汽车服务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岗位可以“雇佣大量的年轻人和女性”。不过，必须保持较低的最低工资水平，这样雇主才敢于雇佣新员工。他说，员工还必须改变对服务业工作的看法：“向你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并不会贬低你自己”。

事实上，皮萨利德斯本人就以其谦逊随和的态度而闻名。比恩说，“克里斯为人谦逊随和，使其总是受到学生们的喜爱。”皮萨利德斯曾担任过大量博士生的导师，其中之一是现任IMF欧洲部主任的雷扎·莫加丹（Reza Moghadam）。在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时，皮萨利德斯不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办公室里。不过，比恩说，“他的办公室门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便利贴，全是学生们对他的祝贺留言……这也是对他毕生研究工作的绝佳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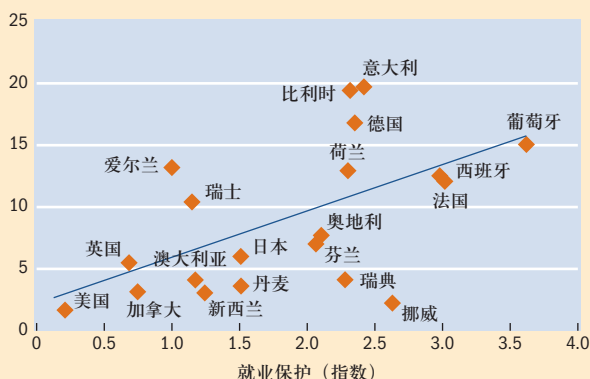
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是IMF研究部顾问。

图2

激冷效应

旨在保护工作者免于失业的政策会抑制就业岗位的创造，从而延长失业持续的时间。

（持续失业时间，月，1995—2007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